

陈茂华 著

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

RICHARD HOFSTADTER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茂华 著



RICHARD HOFSTADTER

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陈茂华著. —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208 - 11576 - 7

I. ①霍… II. ①陈… III. ①霍夫施塔特,
R. (1916 ~ 1970)—史学—思想评论 IV. ①K097.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7523 号

责任编辑 苏贻鸣

封面装帧 王晓阳

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

陈茂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178,000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1576 - 7/K · 2003

定价 28.00 元

时代变革、史学转折与多重面相

——《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序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证明,无论是新思潮的萌发、新学派的诞生还是新思想的出现、新方法的运用,无不与域外(主要是西方)的思潮、学派、思想和方法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中外(西)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了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晚近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就为当代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研究的研究(即西方史学史之史)创造了前提。多年前,我在为李勇教授的《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①一书所作的序文中曾经说过,时贤研究美国史热矣,研究美国历史的历史(美国史学史)却相对滞后。现在看来,这一评价不对了,相对滞后的美国史学史研究,在中国新世纪,即晚近十多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别的不说,自李勇上书出版后,研究现当代美国史学的新著络绎出版,陈茂华博士的《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的问世,又为此添上了一抹亮色。

现当代美国史学成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者,尤其是西方史学史专业方面的博士研究生们关注的热点。^②我想自有其因的。本人在最近的一些学术演讲中,曾专门说到了这个问题。^③

在这里,为读者进一步了解西方史学文化,也为更好地阅读本书,有必要约略回顾西方史学和美国史学的简况:

西方史学的发展,迈入近代门槛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史学发展中心。从国别来看,大体说来,可以作如下的描述:文艺复兴运动最先在意大利发生,因此近代早期的西方史学中心在意大利。

①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② 以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方向为例,张广智所招的博士研究生就有 8 位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③ 参见拙文:《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之大势》,《历史教学》,2011 年第 5 期。

到了17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中心逐渐转移至法国,至18世纪伏尔泰史学,法国俨然成了新的中心,一个领航当时西方史学潮流的理性主义史学的“大本营”。19世纪是兰克史学及其所标榜的客观主义史学之天下,因此德国理所当然地成了西方史学令人瞩目的“霸主”,不仅向欧洲其他国家,而且还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发散出它的影响。

进入20世纪,从表面上看,西方史学如同各路诸侯争霸,没有哪一个能够称王,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如文化形态学派显威于前(20世纪30年代前后),年鉴学派称雄于后(20世纪60年代前后),此后新文化史纷起、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挑战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都似乎成了超越国家和地区的史学景观。但硬是要问,这个时代的史学的国别中心在哪里?个人以为,还是选择美国较为适宜。

说起美国史学,它其实起步很晚。正当19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史学仍比较落后。历史学家赴欧、尤其是到德国兰克那里“朝圣”,是当时的一种时尚。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美国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国际地位的上升,也促进了美国史学的发展。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提出了“边疆论”,从此开始,现当代美国史学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不过,由于美利坚民族的开放性与实用性,20世纪以来美国史学色彩斑斓,内容宏富,其发展趋势是趋向于多元的,这种趋势为现当代美国史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我个人之所以选择20世纪西方史学的国别中心为美国,大致还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1. 把异乡的种子移植到本土开花结果。美国史学在成长与发展的进程中,处处显示出它的根在欧洲,这种历史的姻缘关系,欧美史学的合流,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的。不过,现当代欧洲史学的发展还得仰赖于美国,没有后者的支撑,它也许就会沦于平庸,而失去在国际史坛上的影响力。比如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史学”,只有到了美国人埃里克森那里,才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又如,计量史学的“排头兵”是法国,但它只有到了美国,才在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那里获得全面而又充分的发展。于是,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才可能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的“亮点”。

2. 网罗世界各国之良史。在这方面,美国人也占尽了便宜。比如,二战时,不少欧洲史家亡命美国,尤其是犹太裔的欧洲史家更是栖

身于那里。战后,许多欧洲史家留在了美国。例如,我国史学界熟知的一个老朋友,伊格尔斯,他就是犹太裔德国人,二战后成了美国公民和美国历史学家。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不断地从大洋彼岸传来了他们的声音,其史识与新见,常常令国际史学界同行刮目相看。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大概在世界各国中,也只有美国有这样的本事将别人家的“良才”挖到他们那里去。无怪乎,美国历史协会的13 000名会员中,竟有5 000余名分别来自40多个国家的“异乡人”。

3. 史学的国际化趋势。这一点与上述第二点有关,这里就美国史学研究的内容而言。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观照下,深刻地改变了历史学家的观念,历史学的国际化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在美国史家看来,“历史研究没有国界”,他们以一种较为开放的心态与宏观的视野,从事跨国界的历史研究,留意从全球文明的角度来选择课题,美国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等大作都可为之作注。

如此看来,在多元化的国际史学格局中,看似无中心,实际上还是有中心的。这个“中心”就是美国。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再来解读茂华的大作,或许更能看得清楚。她的著作以二战后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为个案,摄其史学之魂魄,从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等多个层面,显现霍氏之高远的史学思想,全书探幽索微,剔故纳新,藏智入史,使得大作史论结合,主客一体,积极对其进行哲学思考,能在叙史与哲思的交融中透析传主史学思想的多重面相,引领读者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屡发洞见,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上述之语,毕竟过于简略,故还需要作一番补充,以便彰显这部新著的写作特点与学术价值。

其一,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了解霍夫施塔特。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世界处在一个多元化与多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下,跨文化的对话已成为可能,于是不同国家之间,东西方之间,跨文化的对话就显得十分必要。具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倘都以对方为“他者”以反观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或民族的史学传统,并尽可能汲取他国的经验与智慧,来克服自身的问题,那就可以不断开拓史学的新天地。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应当

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应当理所当然地在“走出去”和“请进来”的中外史学交流与互动中，起到“马前卒”和“急先锋”的作用，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实现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历史责任，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担当。对此，茂华在她的这部大作前言部分已有充分认识。

霍氏生活在 20 世纪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面对动荡不安、曲折多变的现当代美国社会，其政治倾向和史学思想，无不受到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深刻影响，被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时代洗礼。这正如茂华在本书第一章中温情地叙述的那样，霍氏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面对一个跌宕起伏的世界。这个世界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的思想历程和政治选择。30 年代末的政治激情，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组织，对社会主义一度向往而后又迅即失望，1934 年退党，以此为分界线，他逐渐远离了左翼思想，开始接受自由主义；二战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如火如荼的国内民主与社会运动的洪流，使进入盛年的霍夫施塔特更加理性地思考和关注现实生活，潜心研究美国历史。研究霍夫施塔特的史学思想，当然需要把他放在 20 世纪时代变革的洪流中做出考察，方能切中要害，揭示本质。因为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与其所生活的历史时刻直接普遍存在关联。然而，倘若只是如此论述时代“大变革”对霍氏思想的冲击，未免有机械唯物主义或教条主义之嫌，作为个体的史家之史学思想将被遮蔽在普遍性层面上所做的思考之下。可喜的是，茂华极为关注霍氏的个体心性，深刻地剖析了这位历史学家的性情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联。从该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家的主体个性对其所选择的研究主题，乃至研究方法均有很大影响。澄清其个人因素，恰恰是为了获得对霍氏史学思想的整体理解。

其二，在西方史学转折的历程中认识霍夫施塔特。

综观西方史学史，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西方史学发生了第五次转折^①，“跳出欧洲，跳出西方”，英国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独具慧眼，不失远见地提出了历史学家应当“重新定向”，自此西方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这在美国史学界也迅速地得到了反映：此时，不管是二战前的“边疆学派”，还是“进步学派”，都已成了明日黄花，适应战后时代

^① 初见张广智、张广勇的《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后在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等书中完形。

与社会需要的“利益一致论”史学派勃起,他们以全面批判进步学派之学说为己任,强调美国历史进程中的“内在和谐”与“利益一致”。进入60年代,“新左派”史学兴起;70年代以来,现当代美国史坛“群雄割据”,各路英雄好汉都跃跃欲试,都要去“华山论剑”。由此可见,战后的美国史学之进展充满了变数,就像走马灯那样。但不变的是,面对时代的变革、史学的转折,一个有自觉意识、有社会担当的历史学家为求真和致用而始终不渝的追求。霍夫施塔特正是这样一位在现当代美国史学转折过程中显示其卓尔不凡的历史学家。即,茂华在书中所说的,“不为时代浮论所惑的独立精神”。这种“独立精神”体现在何处呢?沿着著者的思考路径,我们了解到:霍夫施塔特坚持带有些许激进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历史观;主张历史研究者在现实生活的关怀下以问答逻辑的形式探究过去;在社会科学大行其道乃至“侵入”历史学领域的时刻,清醒地提出社会科学之于历史考察技艺的“视角”功用,并不忘倡导历史写作技艺之文学传统。霍夫施塔特去世后,西方史学先后发生了“语言学的转向”和“文化的转向”,似乎恰好印证了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的价值所在。

其三,在多重视野中理解霍夫施塔特。

以“多重视野”(或不同角度)来评价一位历史学家,这很重要。诚然,倘若随意给霍氏戴上一顶帽子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并不可取,这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必须摒弃的做法。过去我们曾经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给美国“共识”史学家戴上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理由是资本主义是腐朽的,美国民主是虚伪的,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史学家不是“反动文人”是什么?在50年代,我们不是给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戴过“反动学派”的帽子吗?世风日移,拨乱反正,这种“乱戴帽子”、“乱打棍子”的时代过去了。当下,我们应当如何评价霍夫施塔特的史学思想呢?或说他是“保守主义史学家”,或说他是“新自由主义史学家”,或说他是其他什么的。在以往关于“利益一致论”史学的论著中,多将霍夫施塔特冠以“新保守主义史学派”的代表。当然,学术探讨,见仁见智,尽可言说。但在这里,我特别欣赏茂华在这一问题上的洞见,她十分谨慎地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和判断霍夫施塔特的史学思想之变与不变。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指出“共识”史学的合理性。在前言部分她说到,她不能因为自己的知识结构而无法“追踪”霍氏,就“误解”了他。她始终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只能不断地走近这位历史学家,即便如此,也可能只

是在浅层次上了解其人其书,但能够做到此,她就会有一种“真实的兴奋”!说得多好。看来,茂华对学问之真谛,可谓是深知其道了。

以上三小点,说的是评判与研究一位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须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对史家所发生的影响,同时在史家回应时代变革的进程中,捕捉其文脉及其志向,这是说的外在的因素;之于说到内在的,那就是史学自身的新陈代谢,在这过程中考察史家,尤为关注历史观和史学观(它们合二为一大体构成史家的史学思想)的嬗变;一般说来,学者研究史学之进展,多以新材料之发现为首途,其次是新方法之运用。这两者固然重要,但我以为新视角之转换尤为重要。同样的一份材料,倘随着研究者视角的转换,就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对一位史家(或学派)的深入研究,庶几可矣。

岁月易逝,茂华随我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已有十余来年。从确定“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这个选题,历经开题—写作—答辩—修改—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再修改—定稿,也接近十年了。有道是,十年磨一剑,她用十年时间磨亮了属于她的“宝剑”,现在终于可以出鞘了。作为她的导师,我见证了她这十年的勤奋而又不失光彩的岁月。有学者看好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认为也许他(她)一生中最好的研究成果就是在这个时候做出来的。此言不虚,我以自己亲身指导多名博士研究生写作学位论文的经历,信然。当然,这些年轻人的学术旅程还很长,经过博士毕业后的锲而不舍的努力,可能会写出超出博士生时代的研究成果,对此我也信然。茂华的这本专著就是一个显例。这是一部关于现当代美国史学演变的新成果,一部关于霍夫施塔特史学思想的力作(在答辩时候的博士论文基础之上修改了三分之二之多),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史上,留下了她的足迹。我欣慰地看到,她的理论深度大大加强,材料运用很是丰富。但以此就断言这部著作就是茂华一生中最好的研究成果,为时尚早,她的学术之路还很长。作为她的导师,我多么希望她今后继续努力,永不满足,推出更好的研究成果来回报社会,奉献学界。

以上是为序。

张广智

2013年6月于复旦书馨公寓

前 言

在美国现当代历史学家当中,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 1916—1970)无疑是一位极其引人瞩目的人物。作为来自波兰的第三代犹太移民,他在美国学界获得了广泛的盛誉。被誉为“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越南战争期间最有影响、最杰出的历史学家”,^①是“70年代美国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②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的历史学训练是在“二战”前完成的,主攻方向为政治史和思想史。但他并不是一位固守传统史学的研究者,在“二战”后新史学蓬勃发展的学术语境中,他始终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和不断学习的精神对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力主学术创新。当他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设定为美国历史上的主流意识形态——维系一个社会现存秩序的政治活动的思想体系,并由此创造性地将政治史和思想史整合在一起时,便标志着他已经成为20世纪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领域内独树一帜的大家。令人扼腕的是,天妒英才!

尽管如此,英年早逝的霍夫施塔特仍然著作等身。他为后世留下了七部学术专著、多篇学术论文、论文选集和资料选编。在此我们仅列出六部专著、一部论文选集和两部资料选编。这六部学术专著分别是:《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944)、《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an Who Made it*, 1948)、《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① 鲍勒·S. 法斯:《20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1983年版,第212页,转引自常绍民:《霍夫施塔特与〈美国政治传统〉》,载于《美国研究》,1994年第3期。

② 戴伊:《谁掌管美国》,张维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214页。

R., 1955)、《美国生活中的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1962)、《进步派史学家: 特纳、比尔德、帕林顿》(*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1968)、《政党体制思想——1780 至 1840 年期间美国合法反对原则的兴起》(*The Idea of Party System: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0—1840*, 1969)、《1750 年的美国: 一幅社会素描》(*American at 1750: A Social Portrait*)。其中,《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书于 1946 年荣获贝弗里奇奖(Albert Jeremiahl Beveridg),《改革时代》和《反智识主义》分别于 1956 年和 1964 年荣获普利策奖。非常遗憾的是,最后一部专著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霍夫施塔特就病故了。一部题名为《美国政治的偏执狂形式及其他论文》(*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1965)的论文选集;两部资料选编为《从革命到内战期间美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 1765 至 1865 年》(*Great Issues in American Histor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 1765—1865*, 1958)和《1900 至 1915 年期间的进步主义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900—1915*, 1963)。1959 年,霍夫施塔特被授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最高学术荣誉的德威特·克林顿讲座教授头衔(DeWitt Clinton Professorship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Institution)。巧合的是,1988 年,他的得意门生、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也被授予了这一殊荣。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想要探究美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学者都无法绕过他的学术奠基之作——《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该书被著名的兰登书屋(Random House)评为西方文学界 20 世纪 100 本非虚构类经典著作之一,几经再版,销售量达到了 100 多万本。自出版后就一直都是哈佛、哥伦比亚等美国著名大学历史系、政治系、哲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读书籍,是“二战以来对美国政治史的教学和出版影响最大的几部书之一”。我国学者较早评介霍夫施塔特史学的常绍民先生也有感而发:“说到美国现当代史学,必然要提到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提到他的《美国政治传统》。”^①时至今日,霍夫施塔特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成为学

^① 常绍民:《霍夫施塔特与〈美国政治传统〉》,《美国研究》,1994 年第 3 期,第 132—137 页。

者们反复讨论的对象,尤其是表现于《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书中的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思想和文学艺术性技巧;而他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识主义》所使用的概念“反智识主义”和《美国政治的偏执狂形式》一文中的“偏执狂风格”,则被媒体频繁地引用,从而为大众所熟知。

在美国人对自身文化和国家认同充满困惑的 20 世纪末,美国学者史蒂文·魏兰德(Steven Weiland)从人文社科学术的视角出发,称赞霍夫施塔特是 1935 年至 1990 年期间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intellectual craftsman),兼具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的气质。^①著名的文化史家彼得·盖伊(Daniel Geary)进一步指出,霍夫施塔特并非仅仅是一个追求以学术中立来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更是一个力图为当时的美国社会谋求更多福利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他赞誉“霍夫施塔特是美国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历史学家们都羡慕他文笔优美、洞察力深邃、能够利用历史阐明当代问题、同时赢得了学者和公众。”^②乔治敦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则带着一种浓厚的情绪宣称霍夫施塔特的学术声望“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都几乎无人能及……在美国的历史学家当中,只有比尔德(Charles A. Beard, 1874—1948)才能够与之相提并论”。^③这三位学者对霍夫施塔特的赞誉,实质上表达的是对美国知识界的深刻忧虑——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日益消失,并不仅仅直接指向网络技术时代历史作品普遍意义的缺乏这一事实。没错,他们更为赞赏的是霍夫施塔特作为 20 世纪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声望。

只要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课题感兴趣的人们,想必都熟悉或了解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纽约知识分子群体。这是一群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并以专业知识为利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被誉为民族和社会的“智识”和“良心”。他们大多是活跃于人文学科领域的犹

① Steven Weiland, *Intellectual Craftsmen: Ways and Works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1935—1990*, The State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1991, p. 157.

② Daniel Geary, “Richard Hofstadter: Reconsideration”,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35, No. 3(Sept., 2007), pp. 425—431.

③ Michael Kazin, “Hofstadter Lives: Political culture and Temperament in the work of An American Historian”,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27, No. 2(Jun., 1999), pp. 334—348.

太移民后裔,以世界主义即世界大同思想为核心价值观。“二战”后,霍夫施塔特正式成为纽约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首先,他的所有历史著作都打上了与学术中立相对的“价值判断”——专业知识通过严肃的研究和流畅优雅的表达获得了价值属性——之烙印,其历史分析和解释进入了“公共领域”。其次,在学术写作这种言说方式之外,他还出现在公众面前,理性而又大胆地表达他对公共权力的批判。我们在这里仅以两个事例来透视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霍夫施塔特。1968年4月初,《纽约时代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邀请霍夫施塔特就当时公众们最为关心的美国在越南的前景进行讨论。他认为美国政府妄想越战中速胜的期望是不现实的。相反,随着战争伤亡人员的日益增加和战争的延续,将会激起美国国内更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最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导致来自右派人士的“反攻”。他批评政府对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迷信导致了美国人的傲慢,使美国在越南遭遇了重大麻烦。他指出,这种军事霸权的幻想可以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社会心态中找到它的根源。为此,他提议美国政府要承认它作为一个全球领袖在物质、政治和智力资源等方面所具有的局限性,重新正确评估美国的实力,不要以军事方式处理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①1970年夏,《新闻周刊》(*Newsweek*)邀请六位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参与讨论此时正遭遇严重分裂危机的美国。此时的霍夫施塔特,病情十分严重,只能坐着接受采访,但他思路清晰,见解独特。他指出,美国年轻人在精神上和职业上的一种无归属感,充分体现出他们对传统价值体系——美国自由主义——的深刻怀疑。他从专业的视角分析道,曾经在美国历史上发挥着维系社会纽带作用的教堂和大学,在冷战思维的主导下丧失了它们原有的尊重,这大大削弱了社会凝聚力。最后,他颇为严厉而又愤怒地称“60年代是垃圾时代(The Age of Rubbish)”。^②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历史学研究领域内出现一块专属于史学史的领地。从既有的写作实践这个视角来看,史学史指涉的是主要按照时间序列探讨作为个体的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各个时代的历

① Hofstadter, “Uncle Sam Has Cried ‘Uncle!’ Befor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9 May 1968), pp. 121—125.

② “The Spirit of ’70: Six Historians Reflect on What Ails the American Spirit,” *Newsweek* (6 July 1970), p. 23.

史学家对重要历史问题的历史之研究(即学术史)的研究领域,是文化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二战”以前,史学史的价值并未完全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二战”后,尤其是 60、70 年代历史哲学领域内发生了“语言学的转向”后,以作为个体的历史学家的思想为研究主题的著述日益增多。事实上,20 世纪以来在史学理论方面影响最大的两部力作——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和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就是建立在对若干历史学家文本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正是在这两位历史学理论大师榜样力量的推动下,历史写作的性质和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或者说,实践着的历史学家个体及其历史写作日益受到重视。当我们翻阅“二战”后出版的几部史学史研究著作,发现虽然它们的思考路径大相径庭,但对作为个体的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进行一番检视却是他们进行理论反思的共同支撑。事实上,不仅在专门的史学史领域内如此,就是我们平常阅读到的历史著作也常常是对某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的不断重写。自称为后现代学者的荷兰历史哲学家弗兰克·安克施密特(Frank. A. Ankersmit)说过,我们如今所面对的历史研究从整体上看并不是自传统历史学研究规范本身所要求的那种借助所谓的第一手史料——原始资料——以获得过去的真相的学术活动,而是就各种论题,尤其是争议甚多的论题所做出的多种历史解释,而且一种解释越有说服力和权威性,它所引起的写作就越多。历史作品的“过度生产”就是最好的证明。^①由此可以想象,在当下的微博化时代,在历史学文本化的学术语境下,史学史必将在人文学术研究领域内实现“生命的怒放”。

就作为整体的 20 世纪西方史学史文本而言,在历史学范型转变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不少重要的史学流派和出色的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著述从理论考察和分析的视角看,基本上都是以反思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为主要对象的,不仅体现了或者形塑着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学理论,而且反映出许多与历史学家相关的学术领域的理论变化。从历史

^① F. R. Ankersmit,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5., No. 4(Dec., 1986), pp. 1—27;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8., No. 2(May., 1989), pp. 137—153.

学文本化的视角进行检视,这些历史学家就是我们研究过去时面对的一个个“事实”或者说档案材料,是一个特定的时代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思考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进入他们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的一条条路径。当我们如此看待历史学家及其学术历史写作的重要性时,实质上我们已经将这些历史学家视作一个个“文本”,而将他们所处的世界视作不同的“语境”。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些个别化的“文本”不仅反映语境,而且还以独特的个体心性影响和塑造着“语境”。原因在于这些个别化的“文本”拥有自己的“思想”这一利器。历史学家参与社会创造的实践方式主要在于其历史研究活动这一思想行动。因为任何一种学术研究活动都是其研究主体自身思想观念的外在化形式,而研究成果则是其思想观念的载体。在历史学领域,历史学研究范型的转变绝不仅仅是诸如历史著述体例、著述范围等表面形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一套根据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所形成的关于过去事件的信念的变化,以及在变更了的观念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整套概念、规则等方面的变化。简言之,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学观念之重大变化导致了历史学研究范型的转变。

众所周知,出道较晚的美国历史学研究在 20 世纪一直以“标新立异”和“繁荣”著称于学术界。不得不说,“标新立异”和“繁荣”很能吸引眼球,但却未必就能赢得世界学术界的认可和敬重。我国研究美国史的专家李剑鸣先生曾探索过“繁荣”这一表象背后的学术原因:为什么历史学研究看起来十分繁荣的美国却产生不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历史著作和世界公认的史学大师呢?在对 20 世纪的美国历史学研究状况进行了一番梳理和辨识的情况下,李剑鸣先生道出了个中缘由:“专题研究为胜,宏观综合相对薄弱”之故。^①这当然是在纯学术理路的视角下得出的结论。然而,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下去,或许可以在 20 世纪美国广阔的社会语境中找到更深层次的原因。对此,我们相信,通过审查 20 世纪某位重要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写作,特别是其生活世界发生剧变的重要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写作,不仅将为我们考查历史学理论的变化得失提供一个重要的窗口,更加会为我们洞悉那个历史时期美国社会的变迁

^① 李剑鸣:《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1999 年第 1 期,第 17—37 页。

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从而丰富我们的历史学思想和历史知识,在加深我们对 20 世纪美国社会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历史学家的个体意识和个体心性。基于此,在 20 世纪众多的美国历史学家当中,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进入了我们的课题研究视野。

历史哲学中有这样一个命题:历史的意义是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得到显现和确定的,或者说,历史文本的真实性是在后续历史进程中得到证实或证伪的。从 20 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的历史实践和历史文本来看,历史意识被规范为现代性的记忆形式,指引着书写过去的主体(这里主要指历史学家)有意识地通过回忆的功能由现在进入到过去,接着再从过去返回到现在的过程中进行反省,以便于滋生意义和确认差异,即,实现柯林武德所指称的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认识我们自己”这一目的。同时,这也是一个拒绝遗忘和突破自然时间重复性而使其转变为历史时间的过程。就霍夫施塔特文本而言,其历史性意义特别彰显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时代。也就是说,霍夫施塔特主要是作为一个历史文本得以研究的。而且,无论是 1985 年美国学者苏珊·贝克尔(Susan Stout Baker)的研究成果——《激进的开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与 1930 年代》(*Radical Beginnings: Richard Hofstadter and the 1930s*, Greenwood Press, 1985),还是 2007 年另外一位美国学者大卫·布朗(David S. Brown)为霍夫施塔特所作的学术传记——《霍夫施塔特:一部学术传记》(*Richard Hofstadt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一经出版,都引发了一个非常有趣且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书评家们往往不是针对传记写作本身的优缺点发表学术评论,而是直奔霍夫施塔特的历史写作而去——再度回忆和探讨他的历史研究及其写作。大多数评论者都表现出对霍夫施塔特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思想表达方面较高程度上的羡慕和钦佩。就历史学家这一身份而言,更重要的一个事实在于,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其著作最大的优点在于描述和分析政治意识形态。这是他为后来追随他的政治思想的、政治文化的历史学家提供的天赋……这也是让他的著作仍然与今天相关的重要原因。”^①笔者认

^① Daniel Geary, “Richard Hofstadter: Reconsideration”,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35, No. 3(Sept., 2007), pp. 425—431.

为,这些研究都多少涉及了霍夫施塔特的史学观念与他成长和生活于其中的政治氛围和学术潮流或学术体制之间的关系,但却没有进行系统的讨论,尤其是他的史学方法论思想和历史写作之特征讨论得就更少了。在本研究中,让我们暂且将这些对霍夫施塔特本人的赞誉之声搁置在一旁,直接进入到了他的历史文本中去。

本研究认为,从霍夫施塔特的历史文本对观念之信仰的根本性作用的阐释来看,已基本上成功地解决了“谁是美国人”这一课题,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主要体现于今天的学术界和社会普遍承认美国的确是一个以观念而非种族立国、治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历史作品意义的模糊性和多义性,但历史学家的作品总有一定的意义方向,才具有被共同接受的可能性。实质上,这也正是近年来学术界和社会日益关注的如何思考历史意识和集体记忆张力之间的关联的一个热点问题。毕竟,“封锁或开启国民记忆的是历史学家”。^①其次,霍夫施塔特为美国的学术研究培育了一批出色的学者,他们中有我国读者最为熟悉的、《美国自由的故事》(*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的作者——埃里克·方纳和《精英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的作者——身兼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双重身份的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他们虽然在诸多历史观点上与霍夫施塔特分道扬镳,但他们都一直关注自己的导师曾经聚焦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美国政治文化的可能性与局限性,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们成名后追忆起霍夫施塔特,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他们的学术成就大大受惠于这位导师的精心指导。美国移民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在为李本森所著的《特纳与比尔德:重新考虑美国的历史写作》(*Turner and Beard: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Reconsidered*)写的书评中说,比尔德不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学生……;他对后来的学术影响甚微”。^②如果说这一看法在学术事业和学术精神的延续方面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霍夫施塔特更称得上是一位为历史学研究作出贡献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在学

①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

② 转引自【美】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杨豫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01页。